

九江兵变述略——以《申报》报导为中心^{*}

陈 晓 鸣¹ 钟 凌 云²

(1.2.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1922年8月2日晚间,长期驻屯九江城内的陆军第一团士兵突然哗变,造成巨大影响。变兵到处抢掠财货、焚烧店铺,商埠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万元,形象受损,对外贸易下滑。社会各界为之震惊,提出惩凶赔偿、撤退驻军、市民自治、维护社会稳定等诉求,更有甚者提出将九江全部划为租界;而地方官员则尽量推卸责任,企图以增加税收来弥补兵变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持市面稳定。造成此次兵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国家财政匮乏,拖欠兵饷,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地方官吏腐败,督察失职等。

[关键词]九江兵变,《申报》,军阀统治,社会动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8-0042-06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兵变频发,^①仅1922年见诸《申报》的就有数十起,涉及直隶、江西、河北、湖北、安徽、湖南、贵州、热河、陕西等十数省域。在江西境内与九江兵变并举者则有:万安龙泉兵变、吉安兵变、丰城豫军哗变、奉新、崇仁兵变等数起。其中《申报》从1922年8月4日至9月17日持续对九江兵变进行跟踪报导,其篇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为1922年兵变报导之最,这与江西时局、九江的地位、兵变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以《申报》报导为线索,结合有关史实,就九江兵变的过程和原因、社会各界的应对以及对民生的危害等方面作些简要论述,希冀以个案的研究,加深对北洋时期社会图景的认识。

—

1922年8月2日发生在九江的兵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报导频出,且有抵牾。《申报》1922年8月4日至5日引述的相关报导有如下列:

【收稿日期】2019-02-1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九江城市转型与鄱阳湖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1450—1949)”(项目编号:14BZS068)、江西省社科十二五重大委托项目“九江开埠与鄱阳湖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1858—1949)”(项目编号:15WXTD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研究举其要者有:方庆秋《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郭永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原因及特点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辛业《民国初期的兵变与山东社会》,《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彭南生、王闯《小事变,大格局:1921年彭德兵变新探》,《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等。

②④ 《九江兵变之沪讯》,《申报》1922年8月4日,第13版。

③ 《续志九江兵变之沪讯》,《申报》1922年8月5日,第15版。

国闻通信社云:据昨日日本埠军政界各机关消息,江西九江前晚发生兵变,由九时起至昨日午前四时方止,焚烧抢掠,情形甚惨云。^②

国闻通信社云:该项变兵,系前督陈光远部下,变后大肆劫掠,自九江西门至大码头招商轮船局止,其间大马路房屋几全被焚毁……外人财产亦岌岌处于危险地位,幸终未殃,及华人于乱事时,损失生命甚伙,妇女为避免兵士无礼举动,因而投井自尽者,亦颇不乏其人,但死伤详数,一时无从调查云。^③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来电,二日晚八时,在九江城内之第一团兵士似有抢劫情事,枪声骤起,在租界外之外人,皆至租界避难,虽未波及租界,然以交地电话完全不通,故真相不明,现已由英日联合义勇队讲防卫之手段,同时陆战队亦已上岸。^④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消息,此次兵变者为驻屯城内之第一团步兵约三百余名,其原因为不发饷银,劫掠自二日午后八时左右始,亘三小时,城内外被劫者凡数十户,而以租界附近之中国街,受害为最甚,极其惨状,劫掠之兵,在西门外繁盛区域放火后,即多数向下流逃去,火灾亘五小时,焚毁

约三百户，日本人方面 戴生昌轮船分公司亦一起被焚，又此次兵变，因事前并无谣言，突然而起，故一般居民之惊扰不一。^①

北京的《顺天时报》在 1922 年 8 月 5—6 日也相继引述了路透社关于九江兵变的报导：

路透社汉口三日电 昨晚九江城内大肆抢劫，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据称中国木业进出口公司之木料场，经被焚烧殆尽，今晨业已平靖云。^②

路透社汉口四日电 现据九江消息，陈光远所部军队七百名，忽于星期三晚间哗变，向各商界要求大宗款项，嗣经拒绝乃即焚劫。城市惟租界幸未波及，是役城市所受损失约达三百万元左右，计焚毁商铺二百家，现城市中业经平靖，匪徒均已分掠四乡云。^③

据此可知，最早报导九江兵变的是国闻通信社、东方通信社以及路透社。国闻通信社是 1921 年由胡政之在上海创立的私营通讯机构，与北洋政府政见相左，对此次兵变的报导以劫掠惨祸为主；东方通信社是日本设在中国用来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媒体，其关注点在兵变对外国侨民和洋行的影响；路透社则是英国 1872 年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在这次兵变报导中侧重的是商业损失。由于侧重点不同，各方对兵变的报导存在相互抵牾之处。首先是时间不一，国闻通信社称晚九时起至凌晨四时止，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晚八时始亘三小时；其次是原因不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因“不发饷银”，路透社则称是士兵向商界索款未遂；再次是损失不同，国闻通信社过于夸大兵变惨状，东方通信社报道焚毁三百户，路透社报导焚毁两百家，损失三百万。

北洋政府也十分重视此次兵变，为了核实此次兵变真实情况，陆军部向九江派驻一个情况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较为全面的复原了九江兵变发生的全过程，兹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陆军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驻扎九江十余年，此次欠饷七个月，目兵等屡向团营长催索无效，于是散布狂言，如再不发给，只有自由行动。此

举令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惊恐不已，遂与浔阳道尹傅春官和地方各公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后决定由九江商会筹款一万一千元，由吴金彪转交给该团，以发放士兵七月份的军饷；目兵各怀怨望，均不愿领此饷，则秘密约定各分防军队，鸣枪为号，按期起事；八月二日晚上七点，该团士兵身穿便服，聚集在大教厂，随后分散在各街市中，从城内开始一直抢到西门外，将各铺户烧毁二百余家；变兵直抢至是日夜十二点……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④

二

九江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通商口岸，兵变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民生损失之大，几乎是灾难性的。

其一，焚烧劫掠，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九江兵变造成的经济损失各方报导不一。江西督军蔡成勋报告北京府院称，经过核查登记造册，“计被焚壹百零九户，被劫壹百四十六户，共损失洋壹百玖拾万叁仟叁佰四十七元零四分……此外，尚有损失公债票额洋叁拾伍万贰千捌佰拾元”。^⑤据《申报》记者所闻，被抢被焚之家，共计损失已达百万元以上；七十余家店铺被劫后又遭焚毁，损失在两百万左右；另有两百家店铺被抢，大约损失百万元，共计损失四百余万。^⑥陆军部派驻江西的调查员在致金绍曾（陆军部次长）的报告中提到：“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⑦可见，此次兵变直接经济损失约 400 万元是多方的共识。

其二，口岸形象受损，对外贸易下滑。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民国十一年，时局机陧，本埠贸易，略受影响。”^⑧兹将 1922 年前后贸易数据呈于表 1（见下页）。

1922 年九江进出口总额相对于 1921 年仅减少了 37336 关平两，但是进口总额减少了 3553063 两。据查，从国内各口岸进口的洋货以及复出口到国内各口岸的洋货，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降幅分

① 《九江兵变之惨剧》，《申报》1922 年 8 月 5 日，第 6 版。

② 《九江大遭抢劫之电讯》，《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 5 日，第 2 版。

③ 《九江所受损失三百万》，《顺天时报》1922 年 8 月 6 日，第 3 版。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44~245 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 248 页。

⑥ 《九江兵变之大劫》，《申报》1922 年 8 月 8 日，第 7 版。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 245 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第 158 册），北京 京华出版社，2001 年，第 92 页。

表 1 :1921—1923 年九江口岸货值统计(单位:关平两)

年份	进口	出口	进出口货值总计
1921 年	25313745	19099374	44413119
1922 年	21760682	22615101	44375783
1923 年	30912468	31083110	61995578

资料来源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23 页。

别为 31% 和 74%, 1922 年土货出口到国内各口岸,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兵变之乱局使九江口岸形象受损,商业贸易也深受影响。

其三,商铺惨遭焚毁,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在此次兵灾中,被焚毁、劫掠的店铺达 200 余家,波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繁华城区。兹据相关资料将有名号者列表 2 如下。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被焚毁及抢劫的有钱庄、洋货、珠宝银器、食杂店铺、公司机构和公馆民宅等。被烧毁店铺从江西门口到西河街,直至招商局门口为止,从西门外正街,直至张官巷为止,共计 70 余家。200 余家商铺被抢劫,被抢各户遍及城内正街,均处于九江繁荣的商业地带,大量的商铺被焚劫,贸易和民生受到极大的破坏。

三

兵灾过后,“繁盛之区,悉成焦土,死亡载道,惨不忍言”,^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纷纷提出了

各自主张和应对之策。

(一) 民间团体的诉求

民间团体主要包括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九江旅沪旅京同乡会以及南昌总商会等社团。他们要求惩凶赔偿、撤退驻军、市民自治,更有甚者提出将九江全部划为租界,交由外人治理。

其一,惩凶赔偿。兵变爆发的第二天,九江商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兵灾善后办事处”,要求政府赔偿损失,严惩官吏,否则绝不开市。九江各社团代表全体灾民致电北京:“伏愿中央急筹赈抚,暂济灾民,毖后惩前,再图补救。”^②九江旅沪同乡会致电九江各公团:“请政府将纵兵殃民军事当局,依法惩治,人民所受损失,悉数赔偿。”^③南昌总商会也为之响应:“九江此次兵变……即以被害之惨状,论设法抚恤,亦不可少,至于追缉变兵,倘不从速,必致远扬,骚扰无穷,一面须请当道查明变兵原籍姓名,分咨缉办。”^④

其二,市民自治。《申报》1922 年 8 月 12 日以《九江代表赴省请愿纪详》为题,详细记录了九江各公团前往省城请愿时提出的“赔偿损失,遣散驻军惩办军官,市民自治”三项要求。“三项之中,市民自治尤须请准提前办理,俾人心早定”。九江代表态度坚定,表示不达此目的,决不开市。江西旅京同乡会派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祸首,三永撤驻军,四市民自治,五扶恤难民。”市民自治的要求,表达了各界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

表 2 :九江兵变被焚烧及抢劫店铺一览表

商铺类别	店铺名称
钱庄	马晋康钱铺、顺懋钱店、福成钱店、安泰钱铺、晋裕钱号、兆丰钱店、裕元昌钱店、乃裕钱号、惠源钱号、三和钱店、洽成钱店、源发钱号、玉成钱店、同兴钱店、德太钱店、甡懋钱店、久成钱店
洋货服装	傅裕泰洋货号、夏福记洋货号、大洋货铺、裕恒昌洋货店、豫大洋货店、巨昌洋货铺、孙泰隆布铺、生泰隆布铺、涂信茂布店、郑德义布号、陈大昌西衣店、玉兰堂鞋铺、三庆鞋店
旅馆餐饮	浔阳旅馆、名利客栈、春和客栈、亲大方客栈、江安旅馆、仁和客栈、游春源酒楼、万福楼酒馆、吉与楼酒店、稻春村食物号
银店钟表	查永昌银号、凤翔银楼、张吉泰银楼、皮福兴银楼、正大和钟表店、指南斋表店、新慎记钟表店、裕兴钟表店、亨德利钟表店、德芳古玩号、蕴古齐古玩店
食杂店铺	怡和钱米号、源丰祥钱米店、德大米店、蒋恒茂米店、义长源酱园号、郑振茂油盐铺、杨永铺槽坊、华美药房、张春发药店、万铭记药店、新春和药店、劳顺兴药店、李万泰药店、赣振瓷器、铺建华瓷器店、长记瓷器店、郑德茂纸店、郑德懋懋香纸铺、伍文华刻字店、余春和五金铺、鼎成南货店
公司机构	中华书局、永丰报关栈、长江公票局、水巡办公处、福康轮船公司
其他	都天巷公馆、曾醴泉住宅、城内马恒太住宅、城外梅义兴住宅

资料来源:《九江兵变之大劫》,《申报》1922 年 8 月 8 日,第 7 版。

①③ 《旅沪浔同乡呼吁惩治纵兵焚劫军官》,《申报》1922 年 8 月 9 日,第 13 版。

② 《九江兵变善后继闻》,《申报》1922 年 8 月 16 日,第 10 版。

④ 《赣各公团请重惩九江官吏》,《申报》1922 年 8 月 10 日,第 7 版。

其三,划外分治。兵变第二天,九江各公团领袖就向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提出了“划为租界”的主张:“如镇守使无切当维持办法,则绅商为安全计,惟有请外人划为租界,俾免再罹浩劫。”^①同时九江旅沪同乡会分别致电北京、南昌、九江,向各界提出:“以九江为特别市场,配置警察,永远不驻军队,作为缓冲地点。”^②九江各界力求将九江划为租界,不仅仅是因为事发当时英国租界的应对有方,更是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如《申报》1922年8月10日之《浔同乡之兵变善后(杂评)》所言:“此种可悲可耻之事,宁忍一见再见乎,国人虽愚,孰不知国家之体面,今竟置体面于不顾者,因无法以自卫也。”

(二)官方机构的态度

官方机构主要包括江西省议会、省督军府以及九江地方官府等。由于这些机构的处境不同,表态也各不相同。

江西省议会为民请命,电请中央政府惩办九江军警长官,抚恤灾民:“窃国家养兵以保民,今乃肆行焚抢,而地方军警长官,事前既无防范,临行又不维持,尸位溺职,百口何辞,浔埠系通商口岸,洋华杂居,演此惨剧,腾笑外人,本会为民请命,电恳严令查明,先将该管军警长官,依法惩办,并责令追缉变兵,就地正法,一面抚恤难民,赔偿损失,以肃军纪而平民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③

赣省督军府则旨在息事宁人。督军蔡成勋派赣东镇守使萧安国至九江“慰劳”,对商会宣称“兵变之事,亦属寻常”,湖北遭遇四次兵变,保定也有三次,“九江此次兵变,焚劫虽惨……遭一次焚劫,尚算是幸福”。^④督军府如此“安慰”,将自身置之度外,毫无责任感可言。

九江地方官吏则尽其所能推脱责任。兵变当晚,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浔阳道尹傅春官,九江警察厅长韩振山“闻变之顷,均乘汽车往莲花洞躲避”,第二天回到九江后胁迫某报馆“不得登载兵变字样,只可云土匪滋事”^⑤引起众怒,绅商各界人

士将该报馆捣毁,而官方张贴出来的布告则是“溃兵土匪,勾胁兵变”等字样,是谓“军政当局,犹复托词少数兵士,被匪勾胁,妄称平定,自欺欺人,恬不知耻”。^⑥

(三)政府的应对措施

政府迫于压力,为了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具体如下:

其一,抚恤赔偿。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向赣督军蔡成勋提出加捐米税:“查九江为出口米谷会萃之区,拟请就地每石加捐二角,并请财于前陈督军军事费用每石加捐一元内,拨归九江三角,合之此次另加二角,每石计可得洋五角,每年出口以一百万石计,则年即可了此赔偿。”^⑦此举遭到了九江商民的强烈抵制:“官厅尚主张发行彩票,与加出口米捐,以为赔偿,是反加重江西人负担,痛上加痛,我九江人誓不承认。”^⑧督军蔡成勋、省长何护等人表示:“赔偿无成例……省库又属空虚,此层颇感困难。”^⑨最终迫于形势,仅以筹集的一万五千元来救济灾民,以便劝导商民尽快开市。

其二,官吏惩处。对官吏的处置上,仅将原陆军第一团之团、营长撤职处理,警察厅长韩振山坐视不救,且有警察伙劫情事,予以撤任,听候查办;镇守使吴金彪,事前失察,事后又不能制止,呈请中央,予以相当处分;九江县知事张宣中,同负有维持地方责任,乃竟不能事前查觉,报告长官,亦予以相应处分,又驻浔警备队长,亦有处分。^⑩

其三,变兵处置。至于变兵,官方采取“怀柔”手段,予以遣散:“兹于八日下午六时,将十、十二两连兵士一律遣散,监视出境,已雇定康济轮船,装运赴汉,转车回籍,所有前次布告第一团担任之治安区域,自今日起,改由绥远陆军第一团第三营完全担负。”^⑪这也是北洋政府对变兵处理的常态,如1922年7月对直隶保定变兵的处置:“师长王承斌再三抚慰,责以大义,恩威并用,归于平静。”^⑫1922年7月常德盛的豫军在江西丰城、崇仁等地的哗变也是采取“怀柔”手段:“丰城、崇仁两次兵

① 《九江兵变之大劫》,《申报》1922年8月8日,第7版。

②⑥ 《旅沪浔同乡呼吁惩治纵兵焚劫军官》,《申报》1922年8月9日,第13版。

③⑩ 《赣各公团请重惩九江官吏》,《申报》1922年8月10日,第7版。

④⑧ 《九江代表赴省请愿纪详》,《申报》1922年8月12日,第10版。

⑤ 《九江兵变之又一报告》,《申报》1922年8月9日,第7版。

⑦ 《九江兵变之善后办法》,《申报》1922年8月13日,第10版。

⑨ 《九江兵变善后继闻》,《申报》1922年8月16日,第10版。

⑪ 《九江兵灾善后谈》,《申报》1922年8月15日,第10版。

⑫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第24页。

变，肇事官兵未闻惩办一人，以致明目张胆，到处骚扰。”^①

四

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兵变频发，据统计，从1919—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兵变就有206次。^②兵变原因各有不同，然1922年九江兵变的原因与当时江西时局密切相关。

(一)政府财政枯竭，拖欠兵饷

北洋军阀时期，军队数量不断扩充，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据统计每年军费开支持续在一亿五千多万元，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以上。为了筹措军费，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21年至1922年，外国借款减少，军队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兵变更加频繁而猛烈。”^③

江西的军费开支也颇为巨大，1917年陈光远督赣后，从1918—1920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省各年实际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导致江西财政十分窘迫，入不敷出，如表3。

到1920年，全省历年亏欠累计达1300万元。有论者指出：“江西财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尽锱铢，用之者如泥沙。竭闾阎汗血之姿，以供军政不时之需，杼轴虽空，诛求不已。”^④陈光远督赣后开始连续借债：“其中如中行币制借款、长期借款、台湾银行借款为数约四百万元，又十年公债六百余万元，均系陈督任内之事。”^⑤财政困难，军费则经常拖欠。九江兵变因欠饷而起并不是个例，而是兵变爆发的普遍原因。1922年江西多地频发兵变：吉安兵变，岳兆麟部欠饷3个月；丰城兵变，豫军欠饷11个月；南昌兵变，绥远军因索饷而起；

南城兵变，常师积欠军饷10个月。地方财政窘危，入不敷出，军费浩繁，对于本省军费支出尚且无力承担，还要供给援赣军队，实在是难以为继。

(二)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

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是北洋时期的常态。陈光远为直隶人，乃冯国璋的嫡系，1917年担任江西督军，与苏鄂两省的督军李纯、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在长江的重要势力。陈光远担任江西督军五年，排斥异己，扶植亲信。“驻浔军队原为省防团陆军第一团，该团本归镇署节制，因镇守使为吴金彪在浔最久，资格最老，手段亦颇不坏，陈光远初颇患之，恐其取彼而代也。迨陈至京未返南昌，而吴金彪调升赣督之说大盛，陈返任益觉不安，未几而电京撤销吴之军务帮办，并将该团收归自己节制，派陈有龄接任团长。”^⑥在与吴金彪的斗争中，陈光远将该团收入名下，使得吴金彪的赣北镇守使空有其名。恰逢1922年孙中山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一度占领赣州、吉安等地，后因陈炯明叛变，以撤军回援宣告结束。陈光远在赣南战事中失利，请求北京支援，直系首领曹锟罢免陈光远，命蔡成勋率部前来江西助战。^⑦大量外来军队相继进入江西，不仅军队各部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外来军队与江西地方的冲突亦时常发生。驻九江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蔡司令到赣后，将该团归吴镇使节制。^⑧军队相互倾轧，当发生变乱时，自然无法掌控局面。

(三)地方官吏腐败，督察失职

早在九江兵变之前，江西因欠饷而发生了吉安、丰城等地的兵变多起。九江驻军欠饷已久，早就有“不稳消息”传来，新任团长伍金榜“即以军士发动相恫吓，迫使三日内代筹军费七千元，并当众

表3：1918—1920年江西财政收支表（单位：万元）

年份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总收入	864.9		899.3		821.7	
总支出	军费 403	其他 635.2	军费 403	其他 593.1	军费 407	其他 601.3
	1038.2		996.1		1008.3	
盈亏	- 173.3		- 96.8		- 186.6	

资料来源：陈家栋主编《江西财政纪要》，1929年石印本，第15页。

① 《江西南城常师哗变续志》《申报》1922年10月25日，第7版。

② 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81页。

③ 郭永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原因及特点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④ 陈家栋《江西财政纪要》，1929年石印本，第15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59页。

⑥ 《九江兵变原因之一》《申报》1922年8月11日，第7版。

⑦ 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244页。

宣言，有款则负责，否则不负责”胁迫九江商会为其筹款，^①商会迫于形势紧急筹集军费七千元，而伍金榜在发饷的过程中，“除扣伙食外，每兵获饷一元，各军官薪俸，共分去四千元”。^②与其说是欠饷扣饷导致兵变的爆发，不如说军阀的腐败不堪才是兵变的根源。兵变之时，官吏不去想办法控制局面，阻止事态扩大，反而率先逃跑，只求自保。当晚政府无人坐镇指挥，维护治安的警察全不在岗。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身居帮办，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出时官员集体出逃，坐视不救。伍金榜身为团长，不能服众，更不用说在兵变发生时能及时制止。

五

综上所述，九江兵变虽然只是短时段的小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兵变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着多方位的折射，从中也可以管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格局。

当我们把事件置于当时全国范围内考察时发现，九江兵变并非特例，也并非北洋军阀控制区域的特殊现象，它折射的是：武人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对军人哗变大多持怀柔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将骄兵惰，颐指气使，成为祸害地方的根源，体现了军阀统治的封建性。

九江兵变也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它是当时江西时局的必然反映。1922年，正值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南军北伐，与北军南驻，使江西成为各派系军队的云集之地。直系军阀陈光远督赣却拥兵自重，借战事加征、迫使征债款，发国难之财，造成江西财政窘迫，无力养兵，以生兵变。其时一电报，“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土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③充分体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性。

九江忝居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店铺林立，物流畅旺，商业繁荣。驻屯官兵为一己之私，无视军纪法制，抢掠财货，焚烧店铺，严重损害商埠形象，体现了军阀统治的残忍性和落后性。其巨大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的流失，而且造成了广大商民的心理创伤；更严重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使地方民众对北洋政府统治产生了信任危机，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

【作者简介】陈晓鸣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钟凌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责任编辑】王滔滔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Incident of the Jiujiang Mutiny : Focusing on the Report of Shen Daily

Abstract: On the evening of August 2, 1922, the soldiers in the first regiment of the army who had long been stationed in Jiujiang city suddenly led a mutiny. It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mmercial port: The mutinous soldiers looted goods and burned shops wherever they went, which resulted in a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millions of yuan, the damaged image of commercial ports and the declining foreign trade.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were shocked by the incident, proposing to punish the murderer with compensation, withdraw the troops, assert civic autonomy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hat's more, Jiujiang was proposed to be completely classified as a concessions; Local officials tried hard to avoi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nded to raise taxes to compensate for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the mutiny, so as to maintain the market stability.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mutiny: The state was short of finance and in arrears with soldiers' salaries; the warlords were bossy and fought with each other; while local officials' corruption and the failure of supervi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Jiujiang Mutiny ,Shen Daily ,Warlordism ,Society Turbulence

① 《九江兵变之又一报告》，《申报》1922年8月9日，第7版。

② 《九江兵变之大劫》，《申报》1922年8月8日，第7版。

③ 《旅京江西自治会呈北京政府及曹锟吴佩孚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2年5月27日。